

弱势大学毕业生： 在职贫穷与社会资本视野下的“蚁族”

温卓毅 岳经纶*

【摘要】 青年就业是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并由此在世界各地产生不同于传统的青年群体亚文化和行为模式。在中国，大学毕业生和青年农民工是构成青年就业的两大主力。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各大城市近年来都新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如何看待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这一崭新的社会现象，学术界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论文在批判性地回顾有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查的经验资料，认为大学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大都市中的在职贫穷问题，并建议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制定干预政策。

【关键词】 青年就业 大学毕业生 在职贫穷 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 D66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2486 (2011) 03 - 0125 - 21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都在不断经历转型，令青年群体面对众多不同于以往的新挑战，就业困难就是其中一个重大挑战。在中国，有学者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所有年龄组中，城镇16-24岁年龄组的失业率为9.48%，远高于其他年龄组（蔡昉、王美艳，2009）。国际劳工组织2010年8月发表的《全球青年就业趋势》（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报告则发现，2008年青年（15-24岁）的失业率是12.1%，高于全球5.8%的整体失业率，更差不多是成人失业率的3倍（4.3%）

* 温卓毅，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博士候选人；岳经纶，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中山大学983工程三期、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中山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ILO, 2010)。可见,青年就业困难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普遍社会问题。

就业环境的巨大变化令当代青年走上一条不同于前人的人生道路,由此也衍生出众多异于传统的新型群体文化和行为,其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被社会烙上不同的标签,如英国16-24岁年龄组中“不就业、不升学、不接受职业培训”的“尼特族”(NEETs,取自“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1)和“啃老族”(KIPPERS,取自“Kids in Parents' Pocket Eroding Retirement Savings”),以及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等国家成年子女仍然与父母同住并由他们照顾的“大婴儿”(big babies)^①。在亚洲,香港部分“80后”青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台湾大学生流行主动申请延期毕业,中国内地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则成为所谓的“蚁族”^②(对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的一种问题化和隐喻)。

青年农民工(占农民工的大多数)和大学毕业生,是中国青年失业问题的两大主要群体(蔡昉、王美艳,2009)。考虑到两者在教育程度、就业能力、求职意向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本文集中关注大学毕业生群体,并以近年广受关注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现象作为切入点,尝试在相关讨论中引入社会政策的在职贫穷(working poor)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概念,构建理论框架,理清争议和含混,为后续研究和政策干预提供指引。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和推进对城市在职贫穷问题的理解和研究。

一、“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概念的建构与解构

“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是廉思在应用性研究课题《潜在危机:中国“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所建构的概念。他认为,在北京存在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殊群体,群体成员是“大学毕业生”,由于“低收入”而

① 参见 Stay-at-home kids: A worldwide phenomenon. The Telegraph, 27 Apr. 2010.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telegraph.co.uk/family/8474569/Stay-at-home-kids-a-worldwide-phenomenon.html>

② 本文认为,“蚁族”是一个带有感情色彩的名称,并非一个客观描述现状的学术概念,因此本文沿用“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个概念。

“聚居”在城市的角落。这个群体是继农民工、下岗工人和农民之后，中国又一个弱势群体（廉思，2009）。不过，这个弱势群体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尚未“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阶层”。廉思按照这个群体“高智商、群居、弱小”的特征，把他们命名为“蚁族”，因为“一个群体首先需要命名，然后他们才有可能形成群体认同”（廉思，2009；2010）。

廉思在2008年和2009年进行的两次问卷调查显示，这个群体以大学毕业4年以内的青年为主，8成以上的受访者来自外地，多数家庭是在农村或者县级市（廉思，2009）。根据这些特征，有媒体参照“外来工”（migrant worker）的概念，形容他们为“外来高校毕业生”（migrant college graduates）^①。

“低收入”和“聚居”是这个群体的两大特征，前者以低于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和“大学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工资”作为衡量标准（廉思，2009），后者则主要通过研究者的观察确定某一个地方有大量大学毕业生居住，而他们的居住条件是“面积狭小、租金低廉的出租屋”（廉思，2009）。

在廉思看来，这个群体之所以值得关注，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对个人而言，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通常应该能够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和生活，成为社会的主流群体，然而这个群体所面对的现实与这种预期存在很大的落差；另一方面，他们会对个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进行思考和分析，而聚居的生活形态可能促进群体之内的互动并转化为集体行为。“一个庞大的低端白领阶层……必将成为城市中的一个隐患”（廉思，2009）。

基于廉思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在各地展开了类似的调查，研究大学生低收入聚居现象的成因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例如，姚明和曲泽静（2010）在南京市，李怀玉（2011）在河南省进行的研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于2010年3月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成都等6座城市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生存境况进行了调研。在此基础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调研的通知》，要求各地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开展调研，其中一项就是关于“对毕业后低收入大学生聚集群体（“蚁族”）摸底和提供就业服务

① 参见 ShanghaiMonthly, How Migrant College Graduates' Job Issue Really Is Like. Available online: <http://shanghaimonthly.infoblog? p = 2071>

情况”的研究。这些调研的结果基本与廉思的发现吻合，以湖北省人才中心和武汉大学（2010）联合完成的《湖北省“蚁族”调研报告》为例，调研发现武汉“蚁族”数量约为3~6万，其中家庭经济状况一般或较差的占89.2%。

虽然政府和部分学者展开了众多的问卷调研和个案访谈，但是作为一个新概念，“大学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并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赞同。质疑者认为，“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是一个伪命题，低收入、聚居并非新现象（朱迅垚，2010）。而且，这种现象也不是如廉思所言，是中国大陆独有的社会现象（廉思，2009）。例如，许多在香港高校毕业留港工作的内地学生，由于房租和交通的考虑，都会选择居住在殡仪馆附近。他们或多或少都属于社会边缘的一群^①。

朱磊和魏姝（2010）把这些对“蚁族”现象的解释和质疑归纳为三种说法。首先是市场机会说。这种观点认为，属于“蚁族”的大学毕业生，多为非名牌院校的弱势专业，在市场经济中缺乏获取高报酬的能力。大城市的求职机会能够为他们提供较好的生活机遇，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张鸣，2010）。这些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价值创造与劳动报酬换算并没有受到明显不公平的对待，他们现时的处境是与他们的个人能力相称的。其次是主观偏差说。这种说法指出大学毕业生观念认识存在偏差，固执留守在大城市求职而导致生活条件不济。最后是发展阶段说。在刚开始就业的过渡期生活困难和待遇微薄是普遍现象，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点”（孙晓骥，2009）。陆学艺认为，“蚁族”也是中产阶级的后备军^②。葛剑雄也质疑，定义这个群体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全国符合这个标准的到底有多少人？如果是个别现象，就不必太大惊小怪^③。按照这三种说法，“蚁族”并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政府不需要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加以解决。

不过，各地问卷调查都显示，大城市中的确存在一定数量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他们的居住条件、生活水平都未如理想，但是，“聚居”的形态并不十分明显。或者说，从关注个人福祉的社会政策角度而言，聚居并非是影响他们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相反，假如把聚居作为定义问题的一个要件，反而可能忽略了更

① 参见《愁钱愁工作愁身分，内地生社会边缘挣扎》，明报，2010年6月26日。

② 参见《专家称中产阶层发展入黄金期，蚁族是后备军》，中国青年报，2010年2月11日。

③ 参见《蚁族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中国青年报，2010年3月9日。

大部分零散地居住于城市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因此，有学者在开展有关研究时，弃用“蚁族”的概念，而用“智力型民工”来指称“漂在城市的农村籍大学毕业生”（韩恒，2010）。而且，大学毕业生的可塑性决定了“蚁族”与农民工、下岗工人、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相差甚远，并非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不会形成廉思所希望的那种固定的群体认同。片面强调“蚁族”这个符号，只会模糊问题的焦点，甚至可能带来污名化的效应，或者成为个人逃避现实的符号。

更重要的是，研究对象的特点实际上限制了问卷调查的准确性。现有大部分调研都预设“存在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在这个前提之下，研究者挑选他们认为的可能聚居地，以“滚雪球”或者随机抽样的方式派发问卷进行调查。这种调查方式无法反映这个群体在整体人口中的比例，也无法以抽样的受访人群去推论整个群体的特征。因此，现在大部分的问卷调查，其数据分析都以描述性分析为主，而没有进行更为严谨和高级的数理分析，对现象进行归因和对趋势进行预测。研究对象的特点令现时绝大多数相关研究都只是观察和描述这个群体生存状况的社会学实证调研，少有学者在理论层面对此现象进行讨论。

缺少理论解释的另一个原因如同朱磊和魏姝（2010）总结的，如同廉思（2009；2010）在两本报告文学中所表达的一样，大部分学者是抱着一种人文关怀的心态去开展实证研究的。这种态度取向源于学界普遍认为“蚁族”的困境主要由于其自身特质所造成，难以从学理层面论证改善其状况的合理性。

二、“弱势大学毕业生”概念的建构

大学毕业生乃至更为广义的青年群体，处于生命历程中从在学向就业的过渡，教育政策和劳工政策是思考他们就业困难的传统路径。理论上，就业能力有助得到就业的机会（Maxwell，2007），而教育能够提升这种就业能力，因此能够促进就业（Neumark & Rothstein，2007）。然而，实证研究发现，教育对就业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首先是教育的有效性，原因包括教与学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教学质量低，浪费学生的时间；另一方面是学生能力不足，无法从学习中获益，教育成为他们打发时间或作为延缓参加工作的缓兵之计。其次，教育会提高学生的期望和要求，令他们不愿意接受条件较差的工作而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Mahy &

Vandeville, 1996; Rosenbaum, 2001)。

基于这些研究成果并结合本地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特点，一些学者尝试从宏观的劳动力需求与学校教育的结构性错配，以及微观的个人过高期望与能力不足两个方面，对大学毕业生乃至青年群体就业问题进行解释（韩恒，2010；李怀玉，2011；廉思，2009）。相应地，由此而产生了一些政策建议，包括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创造更多适合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职位、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增加教育投入确保高等教育质量、调整高校院系和课程设置、转变个人求职观念多渠道就业、参加各类进修考试提高市场竞争力等（陈永杰，2011；衣华亮、景海燕，2010）。

显然，考察劳动力市场转型和教育制度改革是一种整体性分析思路，几乎适用于解释所有与青年就业困难相关的问题。针对具体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现象，这些分析思路并不具备特别的洞察力和解释力。同样地，把问题作个人化处理，归咎于个人能力不足和主观选择，然后提出让已经完成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回炉再造接受职业训练以提高就业能力，实际上是一种“谴责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策略。同时只是在重复教育与就业的循环论证，可能令这些青年陷入不断接受再培训再就业而收入没有任何提高的处境。

廉思“蚁族”研究的重要之处在于凸显了一批在学校向工作过渡过程中处于不利境况的大学毕业生。学生在高校就读时，即使教学质量参差，但他们仍然能够得到基本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但是毕业之后的处境出现明显分化。为什么有一部分大学毕业生离开学校就失去大部分的机会和资源，陷入不利境况呢？政府的社会政策如何能够帮助他们及早顺利过渡？如果有一些人从大学毕业那一刻起就注定未来几年会成为弱势群体处于边缘地位，这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因此，需要引入新的概念和理论，描述和分析这个群体现象，把这些大学毕业生现实中的个人福祉和抽象的结构性背景联系起来。

回顾现有的各项实证调研可以发现，这个大学毕业生群体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包括：

（1）离开原生家庭，在异地工作，需要自行承担包括住房、交通在内的所有生活成本，因此，其个人生活遭遇了高水平的“去家庭化”（defamilization）；

（2）原生家庭所在地与现工作所在地相比较，经济发展水平前者低于后者，

即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到经济发达地区工作；

(3) 一般毕业5年以内，处于从学校教育到社会工作的过渡期（school to work transition）；

(4) 收入低于大学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工资，更低于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

(5) 他们在工作所在地是外来者，不能享受所在地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其个人福利遭遇高水平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根据这些特征，本文暂时将这个群体宽泛地定义为“弱势大学毕业生”。

陈永杰（2011）以就业竞争力解释弱势大学毕业生的处境。基于教育部统计资料和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的全国调查数据，他通过逻辑演绎得到大学生拥有就业能力不等于拥有竞争力的结论。这是因为，竞争力是先赋因素和获致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中国存在户籍制度及各地不同的高考录取标准等差异性制度安排，对于竞争力的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出身（先赋因素）极可能大于通过学习所取得就业能力等获致因素。

这个结论提示我们，思考在大学毕业这个转折点出现的问题时，需要从个人生命历程的角度出发，考虑每个个体的起点差异。另外，这个结论是通过逻辑演绎并辅以现有的全国调查数据而得出，而在真正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相当多的因素和变量，因而，需要更多实质的经验性数据进行比较才能确立整个因果关系链条。

朱磊和魏姝（2010）以马歇尔公民身份理论结合社会政策生命历程（life course）的视角审视了“蚁族”群体的成因。他们认为，这个弱势群体的困境不只是单纯自身禀赋不足及市场竞争落败的问题，而是根源于公民身份的缺失，而整个缺失的过程贯穿于他们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具体表现包括户籍制度的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作为城市外来人口选举权利和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权利的缺失以及无法享受同等的劳动保障和社会保护等。

如前所述，现时有限的研究受制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不确定性，也受制于学者对研究对象的认知程度。这些认知上的障碍实际上与弱势大学生群体“大学毕业生”的身份相联系，也体现在前述的“主观偏差说”和“发展阶段说”中。持这些观点的论者认为，一方面，大学毕业生有能力适应和处理困难，另一方面

这些困难是青年进入社会工作必经阶段，无需因为这个群体的大学毕业生身份而给予额外关注。

公民身份视角的引入，不仅在传统研究路径之外增添了新的理论视角，更重要的是，它以普遍性的公民身份取代了特殊性的大学毕业生身份，并引申出对弱势大学生进行利益补偿和充权的福利改进路径。当然，从辨明权利到落实权利，需要更细致具体的政策安排。

无论学者如何界定这些弱势大学生，低收入是公认的特征。姚建平（2011）在研究城市新贫现象中就直接指出，大学毕业生逐渐成为“在职贫穷”^①的一个主要人群。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继续扩张，这类未能获得体面工作和尊严生活的在职贫穷人数可能还会增加。

在社会政策分析中，与从人力资本出发、以就业和教育为着眼点的研究路径一样，从社会资本出发、以贫穷和社会排斥为着眼点的分析角度也是思考个人福祉的重要路径。而且，世界各地在利用社会资本消灭贫穷方面已经累积了丰富实践经验和工具。因此，本文尝试以在职贫穷的角度描述和理解弱势大学毕业生的不利境况，并从社会资本的灭贫功能出发提出政策干预的方向。

三、在职贫穷与社会资本

（一）在职贫穷的弱势大学毕业生

“在职贫穷”（working poor）是指拥有工作但仍处于贫穷状态的情况。它是由于社会经济变迁令传统贫穷形态发生改变，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城市中新出现的一种贫穷现象（new poor）（Hanley et al., 2005）。

不同的政府和国际组织对在职贫穷有不同的定义和标准，如：

① 关于 Working poor 和 in-work poverty，中文学术界一般翻译为“工作贫穷”“在职贫穷”，也有的译作“勤劳贫穷”，媒体和网络则通常以“穷忙族”指称这个人群。在职贫穷的概念在港台地区广泛应用于分析城市贫穷现象，而内地的相关学术讨论还处于起步阶段，文献内容以理论述评（周娟，2009）和对于城市在职贫穷现象的概要分析（姚建平，2009；2011）为主。与此比较，媒体以“穷忙族”为主题的报道则较为丰富。

在职贫穷是指“经济家庭”^①的收入低于贫穷线，而其中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工资（wage）、薪水（salary）或者自雇（self-employment）。家庭成员中没有领取养老金的人士（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 of Welfare, 1978）。

家庭由工人组成，并至少有一位家庭成员就业，税后家庭总收入（包括社会转移）仍然低于贫穷线（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2004）。

每周工作 35 小时或以上，而每月就业收入少于住户入息中位数 50% 的 15 至 59 岁受雇人士（香港政府扶贫委员会，2006）。

中国学者周娟（2009）基于加拿大学者福廷和弗勒里（Fortin & Fleury, 2004; 2005）的研究，归纳了部分国家确定在职贫穷的标准。

表 1 各国在职贫穷的界定

国家	工作的界定	贫穷的界定
美国（国家统计局）	家庭成员一年总工时超过 1 750 小时	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
美国（学界）	承认工作时间超过平均工时的一半，约 1 000 小时	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的 200%
澳大利亚（国家社会经济规划中心）	家庭总收入超过 50% 来自工资	家庭收入低于国民可使用所得中位数的 50%
韩国（健康和社会事务研究中心）	至少一个家庭成员有工作	家庭收入低于官方贫穷线
英国	家中至少有一份收入来自全职或半职工作	家庭收入低于国民所得中位数 50% 或 60%
德国	全职工作者	家庭收入低于国民所得 50%
法国	工作者一年超过 6 个月在劳动力市场中，工作至少 1 个月	家庭收入低于国民所得中位数 50%

资料来源：周娟（2009）整理自福廷和弗勒里（Fortin & Fleury, 2004; 2005）

^① “经济家庭”（economic family）是指不同个体由于血缘、婚姻或收养关系而共同生活在一个住宅单元内所组成的群体。

由以上列举的不同定义可以看到，个人与家庭关系、就业与贫穷状态划分是各个定义都会涉及的内容。差异之处在于一些具体的计算方式，如贫穷的标准、以个人还是家庭作为贫穷的分析单位等。对于是否就业的衡量相对简单，一般以工作时数计算即可。对于贫穷的测量则较为复杂，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有的以官方贫穷线划分，有的以是否享受特定社会福利项目（例如食品券）划分。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对贫穷的衡量标准都以家庭收入为标准，例如，国际劳工组织就提出，个人是区分就业或失业的分析基础，家庭则是计算贫穷与否的统计单元（Majid，2001）。因此，个人的低收入未必属于贫穷，还需要考虑家庭收入情况及个人与家庭的经济联系。

姚建平（2011）跟随廉思等学者“蚁族”研究的思路，启发性地把低收入大学毕业群体与在职贫穷群体联系起来。但是，这两个群体之间的重合程度需要进一步的澄清和说明。

按照前文对弱势大学毕业生特征的归纳，他们都是离开了原生家庭在异地求职，在异地的生活具有单人家庭的性质。但并不能以“有工作但贫穷”把所有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纳入在职贫穷，需要把原生家庭的因素一并考虑。大学毕业生个人及其原生家庭的收入情况显示（表2）：

表 2 大学毕业生个人及家庭收入情况

		原生家庭收入	
		高	低
个人收入	高薪	1 象限	2 象限
	低薪	3 象限	4 象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 1 象限显然是非常理想的情况，基本可以排除在弱势大学毕业生群体之外。第 2、3 象限中，个人是否属于在职贫穷，取决于个人与原生家庭的扶助互动以及家庭环境因素，如家庭中赚取收入的人数、依赖抚养的人数等。比较而言，高收入的家庭扶助低收入的个人比较高收入的个人回馈低收入的家庭更为容易和可行。换句话说，处于第 2 象限的大学毕业生比处于第 3 象限的同侪，成为在职贫穷的风险更大。第 4 象限则是各项实证调研所发现的弱势大学毕业生人群，毫无疑问

也属于在职贫穷的情况。

实际上，家庭是个人社会支持网络的一部分。由点及面，社会支持网络对于异地就业大学毕业生的处境有着重要影响。社会支持网络则是个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

（二）弱势大学毕业生的社会资本

涂尔干在其经典著作《自杀论》中提出，与社区的连接是“一种抵御失范和自我毁灭的手段”（Durkheim, 1897）。这一般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理论的雏形。20世纪80年代，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日渐兴起，布迪厄（Bourdieu, 1985）、科尔曼（Coleman, 1988）、帕特南（Putnam, 1993; 1995; 2000）的研究成为社会资本三大主要知识来源。

布迪厄研究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于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他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了解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续网络相联系，并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Bourdieu, 1985）。布迪厄关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讨论，启发了后续的新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关系的研究。科尔曼继承了布迪厄对社会资本的结构定义，同时发展了功能性的方面。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能够促进结构中个人或集体的部分行为（Coleman, 1988）。

帕特南则关注社会资本在公民参与和政治信任方面的作用，他提出社会资本是为了一致的目标和利益，促进协调和有效合作的网络、规范和社会信任（Putnam, 1993; 1995; 2000）。由于他所提出的概念与政府治理密切相关，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因此为当时掌权的新右派政府所欢迎，成为缩小政府规模、促进社会有效运作的重要工具。

从以上的不同定义，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元素，例如网络、规范、信任等。综合而言，社会资本具有不同的面向和类型。克雷西那和乌普霍夫（Krishna & Uphoff, 2002）把社会资本分为两个维度：结构性（structural）和认知性（cognitive）。前者是指包括关系、制度、规则、程序和惩罚措施在内的社会结构；后者则较为主观，包括社会规范及信任、互惠等价值观。在此之外，科尔曼（Coleman, 1988）和帕特南（Putnam, 1993）提出了一种促进社区集体活动和行

动集体性 (collective) 的社会资本。

因此, 可以从个人或微观的角度, 以及社会、团体及国家或宏观的角度出发, 对社会资本作出划分。微观层面, 个人与他人的社会联系产生结构性社会资本, 从而获得信息、机会和资源以提升个人福祉。同时, 这种结构性社会资本能够在中观层面上, 促进社区的规范、关怀、信任等认知性社会资本, 促进社会参与和社会融合。最后, 由此推动的集体行动能够对宏观层面的国家乃至世界产生影响, 实现共同利益 (Halpern, 2005: 26)。

不难看出, 个人与他人的社会联系是个人福祉乃至社会发展的起点。一个人与其他人的互动越频繁, 社会联系越多, 就意味着他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 能够动员的资源越多, 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相应越强。当然, 这种基于互动和联系的社会资本, 也有可能由于人际关系的破坏而消失 (Coleman, 1988)。

这种结构性社会资本可以分为凝聚 (bonding) 和搭桥 (bridging) (Putnam, 2000) 以及连接 (linking) (Woolcock, 2001) 三种类型, 也有学者将它们称为社会资本的功能 (Halpern, 2005: 26) 或社会资本的网络形式 (Boutilier, 2009: 59-62)。

凝聚式社会资本, 顾名思义, 是把背景或需要相同的边缘和弱势个人、家庭、团体及社区凝聚在一起 (Putnam, 2000)。由于大家都面对相似的问题, 成员之间比较容易相互了解和认同, 互相支持和纾缓情绪压力。但是, 这种情况也存在同质性高、信息和资源单一的问题, 无法很好地帮助群体成员摆脱困境。而且, 过于强大的凝聚力会增强排他性, 更难与社会其他群体融合, 恶化不利处境 (Putnam, 2000)。

因此, 仅有凝聚式社会资本并不足够, 需要与搭桥式和连接式社会资本配合。在这两种形式的社会资本中, 前者是促成同一阶层内背景相异的个人、家庭、团体和社区联系起来, 互通有无, 互补长短, 主要是一种横向联系 (Putnam, 2000)。后者则着重一种纵向的联系, 是实现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沟通, 促成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合作 (Woolcock, 2001)。

根据现有研究对于结构性社会资本的界定, 对在异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而言, 他们个人的社会联系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并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1. 原居地亲友网络

众多关于人口迁移的研究都指出, 至少在刚刚移居的几年, 原居地的社会网

络是移居者在情感、物质和社会适应上的重要支持。这个网络包括了原生家庭及其他亲属、中小学同学、朋友等。移居者能够透过原居地网络在本地获得就业机会和信息、住房，也可以宣泄情绪并结交新朋友（Lyons & Snoxell, 2005）。

2. 本地亲友、职业和社区邻里网络

弱势大学毕业生在本地也可能有亲戚、同乡、大学同学，以及社区邻里的联系。这个网络涵盖了移居者在本地的工作、消费、社交、休闲等日常活动，是移居者融入本地社会的关键。不过，若弱势大学毕业生形成以地缘、学缘或业缘为主要联系的凝聚关系，他们可能成为不同于一般社区居民网络的异质群体，一方面缺乏与社区居民交流，另一方面对社区居民形成压力和威胁，产生隔阂和限制，不利于摆脱弱势境地。

3. 与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联系

除了个人与个人的联系外，个人与机构的联系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机构包括政府部门、群众性组织、居民自治组织以及近年来蓬勃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服务机构。这个社会网络的表现形式包括举办招聘会、开办培训课程、提供个人服务等，具有搭桥和连接的作用。同时，这种联系可能更多偏向单向的信息传递，要实现双向交流的话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

（三）贫穷与社会资本弱化

美国学者威尔逊（Wilson, 1987）在研究失业造成芝加哥贫民窟问题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一项公共政策在改善一部分人生活质量的同时，也造成社会阶级分化，令另一部分人生活得更差。如住宅隔离制度的取消，使黑人中产阶级能够搬离原来失业率高企的黑人社区，导致原来的社区缺乏传播正面价值、道德规范，而且不能提供失业人口所需就业信息和资源的组织，进一步成为贫民窟。无法离开的黑人居民，既缺少资源参与社区活动，又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逐渐封闭于一个同质的网络。他们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变得更加匮乏，成为“真正的穷人”。失业引致的贫穷问题弱化了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存量，这又反过来令失业和贫穷问题恶化，形成恶性循环（Rankin & Quane, 2000）。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资本与消灭贫穷”（Social Capital and Poverty Reduction）会议上，各国学者就社会资本能否有效减少贫穷进行了争论。多数学

者认为，对于外来移民或穷人而言，社会资本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网络，不但使其不至于被社会孤立和边缘化，更有助于开拓经济资源和获得支援（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s, 2000）。如林南所说，社会资本的预设是在社会关系上投资，将会获得如市场投资一样的回报（Lin, 2001: 19）。解决贫穷问题就是其中的一种回报。世界银行就把社会资本投资作为在全球范围灭贫的重要可行手段（World Bank, 1999）。

四、弱势大学毕业生的在职贫穷与社会资本弱化：广州与深圳的案例

以上部分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说明了大学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大都市中的在职贫穷问题。为了更有力地支撑这一观点，笔者在2010年8月至2011年2月期间，在广州和深圳两大城市对16位弱势大学毕业生进行了访问。这16位受访者主要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进行抽样，并按照前述弱势大学毕业生的标准选取。访问以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形式进行，内容集中关注受访者的求学、求职经历和活动，以及对相关经历的一般性评价。这一研究是中山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的一项关于珠三角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研究课题的一部分。

（一）对个人现状的评价

普遍而言，受访者对于当前个人处境的评价较低，也有个别受访者表示比较满意现时的生活状态。但无论对现状是否满意，受访者通常都把现状归因于个人能力或者社会关系。对于制度性因素如户籍制度和结构性因素如劳动力需求，并没有太多的思考和体会。以广受关注的户籍制度为例，在受访者看来，非本地户籍虽然令他们无法享受一些社会福利，但对生活和工作没有太大影响，只会在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再考虑迁移。在谈到是否考虑调动户口时，一位受访者的说法颇有代表性：

我之前也细细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我确定在深圳这个城市生活，一直工作下去的话，就可以享受深圳当地的福利，因为深圳的福利很多的。好像我们公司那样，如果不是深圳户口的话，就没有住房公积金，而且没有那个生育保险。不过其他四个保险就会买。我后来考虑到，深

圳是一个工作的好地方，但是考虑居住的话，回去我们江门那边好很多。毕竟我们江门是一个旅游城市来的嘛，空气比较好。所以我暂时没调（户口）。一年之后，看情况吧，再决定。（访谈5）

当谈及当前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时，他们一般把自己置于社会中下层的位置。也许出身和经历相近的缘故，他们往往会主动把自己与农民工作比较，并认为处于比农民工略高一个社会阶层。其中一位受访者，家中共三兄弟，他排行第二。哥哥和弟弟读了初中之后就到工厂打工，类似农民工的性质。他是家中唯一的大学学生，他认为自己的前途会比兄弟好一点，“否则当初就跟他们一起去做了”（访谈8）。这种比农民工阶层略高的感觉，更具体地反映在“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比他们（农民工）好”（访谈9）。如果按照以职业划分社会阶层的传统思路，在社会地位上，从事文书并承担部分管理职能的阶层比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阶层略高。从静态的分析角度，这些弱势大学生是受惠于教育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向上流动。

更重要的是，受访者对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要求明显不同于农民工。其中一位受访者就以住房情况作为一个重要的身份区分。当被问到她“是否觉得自己属于打工妹”时，她回应说“应该是吧。如果住在（工厂）外面，应该好点。但是住在宿舍里面，感觉像是个大集体，有点像（打工妹或工厂女工）”。同时她也觉得自己的素质高于工厂的打工妹（访谈13）。

另一位受访者甚至提到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要求，“我一定要有自己可支配的自由时间。每天晚上的或者每周至少一天（自由时间）。如果有两份工作，一份是晚上都要上班和周六日加班，工资比较高；另外一份就是晚上不用上班，周六日也有自己自由时间，但工资比较低。我宁愿选择后者”（访谈1）。

（二）社会网络的规模及同质化

与众多受访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位来自梅州的受访者，其原生家庭为她在深圳工作提供了实质的经济支援，令她完全没有经济负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消费。

“我不知道有没有钱剩哦，一般没有钱就打电话回家。（问：你家人都会支持

你?)会咯,难道饿死在这里吗?(问:从你工作到现在,家人总共支持你多少了?)这个我不知道哦。(宿舍的东西)都是家里带过来的。前段时间就给了两千我”(访谈2)。

由此可见社会网络支持力度对于在异地谋生的大学毕业生的重要作用。然而,研究中绝大多数受访者的社会网络都无法提供这样有力的经济支持。他们普遍缺乏丰富的社会资本,表现为社会网络规模较少且同质化程度高。

由于是异地求职的关系,他们日常交往对象一般是大学同学和公司同事,与邻居没有太多接触,更不了解所住社区的服务和活动。虽然同学之间会互相帮助如介绍工作,但“他们刚出来工作,关系圈比较小,他们还需要依靠父母呢……实际作用还是比较小的,关系圈还是以前的同学”(访谈1)。即使有受访者觉得“朋友多了很多。因为公司很大”(访谈5),实际上也只局限于工作领域。

虽然社会网络规模较小,而且集中在以前的同学和现在的同事,但是在访谈中还是能发现社会网络支持对个人的积极作用。如前所述,大部分受访者对当前生活处境的评价较低,但他们的人际交往为他们提供了在当下的支持和对未来的憧憬。如一位受访者提到:“(目前情况)普通,我还不太敢定义自己为弱势群体……因为我还没有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嘛。起码我还有许多朋友啦、师兄啦。”(访谈3)

另一位受访者则对社会网络对未来职业生涯发展寄予希望,“我在广州可能呆三年或五年左右,那时候经历和学历都已经足够了,去找工作就应该不难咯……加上以前班的同学也有做猎头助理,我考虑过,五年之后去找工作,有猎头能帮忙”(访谈2)。

与此同时,就目前而言,他们还缺少搭桥和连接的社会资本,群体凝聚性强,容易出现朋辈互相影响的情况。一位受访者讲述了一个事例:他读大学时的室友正在外地某证券行工作。后来介绍了受访者和另外两位室友一起到这个证券行工作。试用期间,其中一位室友由于工作不顺,一气之下决定辞职回广州,打电话叫这位受访者一起走,“当时我本来就有水土不服了,但其实这不是主要原因,虽然自己是想坚持下来的,但被他们这样一说就有点动摇了,就回广州来了”(访谈10)。

对于较为低廉的薪酬,受访者一般都表示在刚毕业的几年,待遇低一些不重要,如果能够学到东西,也能够接受。可以说,提高能力、增加经验、累积人脉

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受访者的普遍想法。然而，由于社会联系限于工作单位内部，网络参与层面单一，相比起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受访者，一位已经工作几年的受访者对于未来职业发展并不太乐观，“在公司做文员，有一些做了两年，还是文员，文员工资也就那样了，这样好像没有什么追求，停滞不前了”（访谈13）。

在访谈中，受访者对现状的评价、对个人奋斗的强调、社会交往单一的情况与廉思（2009）的调研发现吻合。受访者的工作和收入都比较稳定，但是收入水平不高，只能维持较低的生活质量。就经济收入这个指标而言，他们的劳动收入仍然高于所在地政府确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在物质上的匮乏程度并不高，不是像缺乏足够食物的那一类贫穷。廉思（2009）发现，对目前消费水平，45.2%的受访者表示“一般”，41.9%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这种不满情绪源于他们未能像城市中的其他人一样生活，缺乏其他人的消费能力，不能有主流价值所定义的标准生活，具体表现在如本研究受访者所表达的住房、时间分配等方面。如前所诉，在静态的社会阶层划分上，他们摆脱了父辈的影响，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向上流动。但从动态的角度看，他们向上流动的速度和跨度可能比不上社会中的其他人群，从而出现实际上向下流动的情况。由此而令他们尊严受损。

在访谈中，很多受访者把自己进入非重点高校归咎于高考失手，同时家庭的经济能力也无法让他们选择自费入读较好的院校。虽然受访者都知道“重点高校的氛围、认识的人都不一样”“要是考上一些比较好一点的大学的话，对个人的心理也是会有影响的，学校的氛围会比较好，自己可以接触到一些更优秀的人，也会更上进一些”（访谈15）。大学毕业后，贫穷和移民适应问题，都可能令他们陷入不利处境。他们在生命历程中一个转折点的失败，可能导致了下一个转折点的失败。他们身边的人也将他们标签为次等或者失败者，他们可能也会习惯失败并将外界对他的否定和指责内化，进而在行为上实践那些被标签的内容，以致陷入连锁的失败而永不翻身（陈国贵，2011）。

五、讨论与结论

对于近年来我国大城市出现的相当数量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一社

会现象，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本文从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两个方面，论证了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核心实质是城市的在职贫穷，并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提出了政策干预建议，目的是令弱势大学毕业生、也是劳动者能够体面劳动，并且有尊严地生活。

本文认为，所谓“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实际上是弱势大学毕业生，他们在本质上属于城市中的“在职贫穷者”。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青年群体情况不同，也与西方福利国家的新贫现象不同，中国的弱势大学毕业生呈现出两大特点：既不是福利依赖者，他们甚至连在当地享受社会福利的资格都不具备；也不留在家中依赖父母供养而出外独自谋生。前者让他们需要通过市场获得各类消费品和服务满足需要，并独自承担本应由政府和企业分摊的成本，高度商品化超越了他们劳动报酬所具备的支付能力。后者去家庭化导致社会资本的弱化，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高度的去家庭化和商品化，令他们在社会分层中不断滑落，与他们所希望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日渐远离。

几经波折，动员各类社会资本，很多大学毕业生可以在劳动力市场找到一份工作。这可以说政府的教育政策和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更应该看到，现行政策单纯以就业为目标，为减少失业率，一味鼓励甚至强迫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免他们日后成为领取社会福利的福利穷人，并没有考虑工作能否让他们得到体面的生活（decent life），也没有相应的社会服务为他们提供支援，令他们成为在职贫穷（from welfare poor to working poor）。这些弱势大学毕业生需要以微薄的收入应付住房、交通等一系列生活需要，不得不选择城市生活成本较低（也意味着生活条件较差）的地方，出现“贫民窟的在职贫穷”（working poor in poorhouse）的现象。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继续扩张和产业结构转型，若没有适当的政策措施，这类在职贫穷人数还会继续扩大。

对于这一个群体而言，需要解决的不限于表面的青年就业问题，而更在于减少家庭出身的决定性影响，给予他们尊严和机会。政府应该实施积极歧视（positive discrimination）政策，投资社会资本，构建信任、互惠和合作的社会支持网络，协助他们过渡。正如英国政府在2011年4月发表的《开启大门，冲破障碍》（Opening Door, Breaking Barriers）（HM Government, 2011）白皮书所提出的，如果把人生分为“基础”（5岁以下）、“在读”（5-16岁）、“过渡”（16-24

岁)及“成年”(24岁以上)四个阶段,在每个影响社会流动的关键时刻,政府都应该有相应的政策协助处于弱势的群体,以促进社会向上流动。例如,为弱势大学毕业生提供在大企业实习的优质机会,弥补他们社会网络薄弱而缺乏工作经验累积的不足,为未来寻找工作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 蔡昉、王美艳(2009). 中国目前失业的基本状况. 参见: http://www.china.com.cnnewszhuanli/09rkld/2009-12/21/content_19105554.htm
- 陈国贵(2011). 贫穷与变迁: 香港新移民家庭的生活故事. 香港: 中华书局.
- 陈永杰(2011). 大学生就业能力与社会不流动.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4(3).
- 韩恒(2010). 漂在城市的农村籍大学毕业生——智力型民工的形成与群体特征. 中国青年研究, 9.
- 湖北省人才中心、武汉大学(2010). 湖北省“蚁族”调研报告. 参见: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1697524.html>
- 李怀玉(2011). 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生活状况调查分析——基于河南的调查. 中国城市经济, 2.
- 廉思编(2009). 蚁族: 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 柳州: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廉思编(2010). 蚁族2: 谁的时代. 北京: 中信出版社.
- 刘飞(2010). 何忠洲: “蚁族”缘起者. 载廉思编《蚁族2: 谁的时代》. 北京: 中信出版社.
- 孙晓骥(2009). 大学生比别人更需要同情吗? 南方都市报, 12月13日.
- 香港政府扶贫委员会(2006). 低收入住户分析. 参见: [http://www.cop.gov.hk/cn/pdf/CoP%20Paper%208-2006\(cn\).pdf](http://www.cop.gov.hk/cn/pdf/CoP%20Paper%208-2006(cn).pdf)
- 姚建平(2009). 中国城镇工作贫困者: 概念、成因及对策. 理论与现代化, 5.
- 姚建平(2011). 中国城市工作贫困者: 问题的形成、群体特征与积极社会政策. 社会保障研究, 1.
- 姚明、曲泽静(2010). 城市“蚁族”幸福感调查分析及影响因素探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 西北人口, 6.
- 衣华亮、景海燕(2010). 对“蚁族”利益补偿策略的理性审视——基于社会公平的分析. 中国青年研究, 6.
- 张鸣(2010). 蚁族多为三流大学毕业生, 无需逃离北上广. 南方网, 2月20日.
- 周娟(2009). 关于工作贫穷研究的述评与展望. 社会保障研究, 3.

- 朱磊、魏姝 (2010). 基于公民权视角的城市蚁族群体再研究. 中国青年研究, 6.
- 朱迅垚 (2010). 蚁族, 一个伪学术概念的传播狂欢. 南方日报, 3月11日.
- Bourdieu, P. (1985). The Social Space and the Genesis of Group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24: 723 – 744.
- Boutillier, R. (2009). *Stakeholder politics: Social capi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corporation*. Stanford: Stanford Business Books.
-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 of Welfare (1978). The Working Poor.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345 – 364.
- 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95 – 120.
- Coleman, J. S. (1994). Soci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Investment in Youth. In Petersen, A. C. & Mortimer, J. T. eds. *Youth unemployment and socie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1). Government Response to the Latest NEETs Figures.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education.gov.uk/inthenews/inthenews/a0074851/government-response-to-the-latest-neets-figures>.
- Durkheim, E. (1897).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 Fortin, M. & Fleury, D. (2004). A Profile of the Working Poor in Canada.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Research Paper.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cerforum.org/conferences/200406/papers/fortin.pdf>
- Fortin, M. & Fleury, D. (2005). The Other Face of Working Poverty.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Research Paper*.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socialresearchandplanning.ca/reports/The%20Other%20Face%20of%20Working%20Poverty.pdf>
- Halpern, D. (2005). *Social Capital*. Cambridge: Polity.
- Hanley, L., Ruble, B. & Tulchin, J. Eds. (2005). *Becoming Global and the New Poverty of Cities*.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wilsoncenter.org/topicspubsBecomingGlobal.pdf>
- HM Government (2011). Opening Doors, Breaking Barriers: A Strategy for Social Mobility. Available on line: <http://download.cabinetoffice.gov.uk/social-mobility/opening-doors-breaking-barriers.pdf>
- ILO (2010).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lm/—trends/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43349.pdf
- Krishna, A. & Uphoff, N. (2002). Mapping and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In Grootaert, C. & Bastelaer, T. Eds.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 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yons, M. & Snoxell, S. (2005). Creating Urban Social Capital: Some Evidence from Informal Traders in Nairobi. *Urban Studies*, 42 (7), 1077 – 1097.
- Mahy, B. & Vandeville, V. (1996). Youth Training Schemes in the Walloon Region of Belgium. In Vries, A. D. , Verhaar, C. H. A. , Ophem, J. A. C. , Goede, M. P. M. D. & Klaver, P. M. Eds. *Youth: Unemployment, Identity and Policy*. Aldershot: Avebury.
- Majid, N. (2001). The Size of the Working Poor Popul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wcms_142342.pdf
- Maxwell, L. (2007). Smoothing the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 Building Job Skills for a Local Labor Market. In Neumark, D. Ed. *Improving School-to-work transitio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 Neumark, D. & Rothstein, D. (2007). Do School-to-work Programs Help the Forgotten Half. In Neumark, D. Ed. *Improving School-to-work transitio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 Putnam, R. (1993).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American Prospect*, 4 (13): 35 – 42.
- Putnam, R.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 65 – 78.
- 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Rankin, H. & Quane, J. (2000). Neighborhood Poverty and the Social Isolation of Inner-City African American Families. *Social Forces*, 79 (1): 139 – 64.
- Rosenbaum, E. (2001). *Beyond College for All: Career Paths for the Forgotten Half*. New York: Russell Sage.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s (2000). Social Capital and Poverty Reduction: Which role for the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state?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unesco.org/mostsoc_cap_symp.pdf
- Wilson, J.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Woolcock, M. (2001). The Place of Social Capital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and Economic Outcomes. *ISUMA*, 2 (1): 11 – 17.
- World Bank (1999). What is Social Capital? Available on line: <http://www.go.worldbank.org/K4LUMW43B0>